

论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之失败 ——兼论清末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冲突

何文辉

(湖南省社科院, 湖南长沙, 410003)

摘要: 1898年前后湖南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激烈政治冲突, 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省政要员的更换和一批文化新锐的到来而出现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科举改革的启动导致了文化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急剧倾斜。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旧精英于是联合起来, 对维新事业展开猛烈攻击。这个事例通常被用来说明湖南地域文化的特性, 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它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关键词: 湖南维新运动; 科举改革; 政治冲突

中图分类号: K25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2-0243-05

湖南维新运动勃发于1895年甲午中国战败之后, 它是一个原本富有共识的官绅集团在民族危机面前自新和自救的努力。这场在全国独步一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曾被危亡之际的国人寄予莫大希望。当时各路精英汇聚湘中, 百废俱兴, 海内外报章交相称赞。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改革运动向纵深推进, 改革集团内部迅速分裂, 并由此衍生出主张激进改革的新派官绅与社会守旧势力之间的大规模冲突, 致使朝气蓬勃的各项新政顿时陷入绝境。它似乎是戊戌百日维新的缩影, 值得作为一个标本, 细致地探究当年改革运动中的利益纠葛以及政治冲突状况, 以便我们从历史记忆中获取某些经验或启示。

一、关于“新派”、“旧派”性质的界定

有关湖南维新运动的论文和著述已经相当多了^①, 这里不再赘述。本文仅就使整个局面发生逆转的改革集团内部的分裂及其新旧冲突状况作一考察。首先, 有必要对冲突双方的主要人物作一些社会学的描述和分析, 看看相争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旧派阵营的领军人物是清末湖南三大儒之一、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王是湖南第一批近代企业的开创者, 维新运动初起时的核心人物。与王

一样曾经赞助新政后来又一同列名《湘绅公呈》讨伐新派的旧派要角有张祖同、黄自元、孔宪教等地方实力人物。此外, 旧派中风头最健的反维新主将是叶德辉, 此人对新政一向漠不关心, 但决非不识时务之人。所有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 他们全都是久居省城的权绅显贵^②。

再看新派阵营。当初卷入新旧纷争并遭到旧派猛烈攻击的维新官绅主要有: 湖南巡抚陈宝箴(江西义宁人); 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广东嘉应人); 湖南学政徐仁铸(江苏宜兴人); 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广东新会人); 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 经学大师皮锡瑞(湖南善化人)。这些人全部来自外省或外府(皮锡瑞虽属长沙府人, 但1897年7月才回湘参与新政, 此前一直客居江西), 他们齐心协力开拓和主持了维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新政: 梁启超是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熊希龄是时务学堂总理、《湘报》创始人; 皮锡瑞是南学会主讲; 徐仁铸以督学使身份大刀阔斧推进科考和书院改革; 黄遵宪则是湖南新政的灵魂, 举凡一切改革章程条例皆由其参酌各国制度一手订定; 而陈宝箴, 他是湖南整个维新运动的支柱。

从上面的描述中, 我们很难得出那个最为人知的结论, 即认为新旧之争是“顽固派”与“改良派”

收稿日期: 2005-01-13

作者简介: 何文辉(1967-), 女, 湖南长沙人,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学理论。

之争。罗志田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从全国还是湖南的实际情形看,甲午中日之战后真正纯粹的守旧派几乎已不存在,而湖南旧派的标志性人物王先谦、叶德辉在当时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新派”^{[1][2]}。这个事实太明显了,以至于研究者不得不修改看法,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认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之争^{[3](379-382)}。这种说法用来解释旧派人物的趋新行为以及他们为何由新转旧是没问题的,但却不能解释新派中也有洋务派这个事实。陈宝箴“原属后党”,其政治思想与魏源、郭嵩焘一脉相承^{[4](120)}。但这无妨他在新旧之争中苦心孤诣维持新政。皮锡瑞是更保守的洋务派,这也无妨他在冲突中坚定地站在新派一边。因此,不论是新派还是旧派都难以从一般的思想倾向或政治立场方面归类,甚至“新派”“旧派”的说法本身就不确切。如果有什么能将两派进行区分的话,一是他们明显不同的地域特征;二是他们在维新高潮中的不同作为。鉴于此,同时鉴于争端起后王、叶等人动员了全省上下一大批守旧势力起来反对维新,我们便有理由将这场冲突描述为:以长沙城的权绅为首的湖南守旧势力对主要来自外省和外府的维新官绅的攻击,攻击的焦点是维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文化新政。而所谓“新派”与“旧派”也只意味着在这场具体的冲突中认同哪一个政治群体。

二、利益之争抑或观念之争

上面的结论提示,1898年湖南的新旧之争主要是由文化教育改革的引起的,其它如保卫局、课吏馆以及早先的经济新政等虽也曾遭遇阻力,却未引起大的纷争。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起争端?两派之间争的什么?论者通常认为,这场争端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学术门户之争。当初《湘绅公呈》给出的理由也说是为了维护风教,抵制康梁异端邪说,以免其流毒乡里祸害国家。然而若此说成立,当初为何引梁启超来?梁启超入湘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王先谦是始作俑者之一,分教习叶觉迈、韩文举的聘书上也签有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等的名字^[5],难道此前他们对康梁的思想主张一无所知?何况梁在湖南的几个月中始终受到礼遇。这就不能不使人疑惑,究竟是康梁学说的危害果真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还是因为党争的需要而将其妖魔化?

尤其不好解释的是,如果旧派的目的是端教术

以正人心,为何容不得皮锡瑞?查皮锡瑞在南学会的讲演,持论相当保守,“重在阐扬圣教,使人晓然于圣教之大,并切实有用”^[6],但他还是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讲义中任何的纰漏都成为攻击的口实,可见为了党争的需要,任何歧见都可以无限放大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旧派中的大多数人对所谓思想、学术毫无兴趣,“公禀十人,惟王、叶两人颇通古今,其余刘、汪、蔡、孔、郑、黄、严、张并不知孔子改制出何书。”^[7]除此之外,旧派阵营中还有一些无关学术、在新政初期也相当活跃的人物,包括前刑部侍郎龙湛霖,曾任江苏巡抚的陈启泰,曾任山东布政使的汤聘珍,左宗棠之子左孝同等。这些人虽未列名《湘绅公呈》,但其旧派立场对新旧争斗中的攻守之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前面的列表中不难推断,如果没有这些豪绅巨室达官贵人的支持,旧派不可能有那样的底气与阵营强大掌握省政大权的新派抗衡,更何况当湖南发生新旧党争时,正是维新党人要在全国大展宏图之际,湖南的旧派逆潮流而动不仅在与身边的巡抚、臬司和学政作对,还在与当朝皇帝作对,而竟然“不为势怵,不为祸动”^{[8](645-646)},是因为他们绝非势单力薄。然而如果顺理成章地将旧派阵营扩大到这样的程度,两派之间的冲突就远远超出了思想和学术的范畴。于是我们回到了那个问题:究竟争的什么?

熊希龄在《湘报》上揭露的一些有关旧派如何争权夺利的事情肯定是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原因。那些事情不值得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也不足以动员与此无关的旧派们。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真正的原因乃是维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文化新政冷落并冒犯了王先谦等文化权绅,进而触犯了一大批旧文化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三、文化新政中旧精英的失落

湖南的文化教育改革始于江标。江于1894年提督湖南学政,到任后大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于是士林风气大变。他还整顿校经书院,着意培养时务人才;又创刊《湘学报》,鼓吹变法。江标的改革得到了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的积极响应。1897年7月,王发布岳麓书院《月课改章手谕》^[9],决定不用八股时文,课经史,增加算学、译书等新课程;同时购《时务报》,劝师生阅读。时务学堂之设,王先谦出力不少,以创办者自居。可以说直到1897年底江标离任

前,王先谦一直是湖南新政的核心人物,那段时期湖南的一系列兴革措施,也主要是陈宝箴及其子陈三立与江标联手并倚重一批地方实力派搞起来的。然而这一局面随着江标的离任和一批新进官员及文化新锐的到来被彻底改变了。

1897年7月,黄遵宪自北京赴长沙长宝盐法道任,兼署湖南按察使;8月,徐仁铸提督湖南学政;10月,谭嗣同从南京返湘,赞助新政;11月,梁启超离沪入湘,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三湘之地顿时群星荟萃。这些人再加上谭嗣同的刎颈之交唐才常、备受王先谦张祖同等省城巨绅排挤的熊希龄,组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激进改革团体,很快将湖南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而此前的新政要角王先谦却被时势推到了旧派领袖的位置上。

徐仁铸的外甥许姬传在其《七十年见闻录中》说:“研舅到任后,……亲自起草《颁发湘士条诫》,继江建霞学使的轨辙,又迈进了一大步,以致引起守旧派的反扑,……新政遭到阻力。”^{[10](39)}这一说法不知为何常被史家忽略,其实很值得推敲。《颁发湘士条诫》是徐仁铸到任后的第一把火,事在1898年1月底2月初。《条诫》内容除勉励士子研究实学以成为通达时务的人才外,还特别要大家研习梁启超编著的《读西学书法》等书目,并写读书心得“呈送备阅,借知所见之当否,所学之浅深。”^[11]接着,徐仁铸又仿张之洞《轺轩语》之例作《轺轩今语》,颁示学宫,其内容也多与康梁说契合。于是士子闻风而动,皆投学政所好,却大大地冒犯了那些山长尊师和八股先生。须知旧时书院制度,往往视山长好恶传一家之言,又专习八股时文,且山长们论资格、分畛域,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徐仁铸此举无异于剥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王先谦虽然思想开明,但作为一代宗师和儒林领袖,其尴尬的处境可想而知。在一封致徐仁铸的信中,王的恼怒之情溢于言表:“阁下主持康教,宗风所扇,使承学之士,望景知归。此次敝郡岁试,弟之亲友,以南海圣人获隽者,不下十人,以南海先生入选者,则指不胜屈。……惟事必行之以渐,似不宜过于迫急。若以威势强人服从,则与西国以兵力胁持行教何异?”^{[12](880)}这种情况下,王先谦等地方文化权威为维护往昔的尊严和地位而反戈一击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与此同时南学会之设,《湘报》之发刊,又进一步扩大和激化了矛盾,使旧派力量得以集结。南学会成立于1898年2月下旬,由谭嗣同等发起,黄遵宪主持开办^{[13](445)};《湘报》创刊于3月初,是由熊希龄

鸿的同志集资创办的,所有参与者全部是外省或长沙府以外的人士^[14]。一度咸与维新的省城绅耆的名字在这两项新政中彻底消失了。《湘报》将这些人排除在外还好理解,因它基本上是一份民办报纸,又由新派中的激进者操持,但格调温和的南学会也冷落这些地方权绅则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情。南学会是湖南维新中最具政治意义的一项新政。当初谭嗣同稟请开学会,黄遵宪立刻就提议将其办成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15]。于是南学会一方面以讲学开绅智,一方面成为官绅聚集议事的场所。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假如湖南绅智已开,又能集合“乡绅为议事,则无事不可办,无款不可筹”,因此他视南学会为“湖南新政之命脉”^{[16](133-137)}。虽然当时南学会还没有正式成为议事机构,但一个具有这种性质的学会,地方官绕开当地实力人物把它交给几个外地少年,将引起的不满和猜忌可想而知,更兼晚清以降湖南绅权大张,豪绅巨室已习惯于让地方官对自己言听计从,当初时务学堂招考张祖同就对巡抚啧有烦言,原因仅仅是招考之时他未能到场^[17],象南学会如此重要的兴革事宜,这些人又岂甘袖手?因此,南学会之设大大地充实了旧派阵营,被冷落的省城权绅从一开始就决定反对这个学会,并且断定它不会长久。当皮锡瑞于开讲之前照惯例请客热闹时,所有旧绅,包括与皮私交深厚的龙湛霖,全部拒绝出席^[15]。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说明新旧对峙已发展到非此即彼,连表面上的应酬都无法维持的程度。而此前已被冒犯心生芥蒂的王先谦更坚定地从新派中撤退了。南学会开讲之日,王在陈宝箴的极力邀请下参加了第一次聚会,此后就不再出席。熊希龄、谭嗣同曾请他讲学,都被断然拒绝^[6]。根据皮锡瑞的记载,当时已形成了“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的局面^[6]。

接下来必须提到的是时务学堂内矛盾的发展。时务学堂酝酿于1897年初,当年10月正式成立。还在筹办阶段,深得陈宝箴信任的熊希龄就与同为绅董的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在学堂经费、招生等事务上齟齬不断。后来为集中事权,众绅聚议各人在轮船、制造、学堂三事中认一事专办,于是“以轮船推归汤、朱,继复推归雨珊(张祖同),以制造推归王益吾师(王先谦),而龄独办学堂”^[5]。因此时务学堂的一切人事、规章、教务等都由熊希龄主理,王、张、黄等绅由是无法在学堂中畅行其志,这使得矛盾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康门弟子占据学堂教席,传播师学,更使旧派如鲠在喉。于是时务学堂成为旧派

火力最集中的目标,巡抚陈宝箴也被拖入争执的漩涡,而熊希龄通过《湘报》对旧派发起了毫不留情的反击,这又使旧派必欲置《湘报》于死地。相争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说,1898年湖南的新旧之争是由这些历史细节构成的。如果没有当时清廷变通科举、改革教育的重大事件作为背景,那么新旧之间的争闹就只是争一时之得失,范围也将局限于权力中心及其外围,而达不到当时实际上所表现的广度和深度。

清廷变革科举之事肇始于1895年的公车上书,1896年设立了京师大学堂,并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陈宝箴和江标主政下的湖南是响应改革最积极的省份。1895年谭嗣同在浏阳开办算学社,次年,湘乡士绅开办东山精舍,皆以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为宗旨;1897年岳麓书院改章和时务学堂成立更是这一改革的突出成就。1898年,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从正月开始,清廷下达了一系列谕旨,飭各省变通书院,广设时务学堂,同时于岁举之外复设经济特科,规定特科贡士可不经会试直接参加殿试,以及岁考废除八股文体改试策论,等等。与此相呼应,湖南的文化教育改革激流猛进,于是有《颁发湘士条诚》、南学会、《湘报》等等,而各府县的开明士绅也被潮流所激荡,纷纷改书院、设学会、办学堂。如郴州士绅集资创办了经济学堂,湘乡、浏阳、宝庆、沅州、岳州、宁乡、新化、常德、永明等府州县的书院或酌改旧章,一律改课实学,或设立学会,讲习一切有益政教之学^{[17](147-152)}。从形式上看,这些措施仅仅涉及教育体制,但由于帝制时代教育制度与科举取士制度连成一体,而科举制又是官僚君主制国家的核心支柱,因此这种局部的体制改革在实质上成了足以撼动全局的重大制度变迁。这是另一个论题,此处不作引申,只强调一点:由这种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成为社会冲突的根源。新学的备受推崇不仅威胁到昔日的文化权威,也威胁到所有从事儒业者的地位和生计。学堂、学会掌握新文化资源的同时侵占了此前一直与旧文化相联系的政治和社会权力资源,比如时务学堂的章程规定:“学生出路,……给予科名仕进之阶,或作为生监,一体乡试,或咨送京师大学堂及出洋学习,或保荐为使署翻译随员,与南北制造等局,差遣委用,”^[18]南学会及其分会被规定为全省各类学会之首,其会员享有干预地方事务的政治特权,品学优秀者可经巡抚、学政考核后送总理衙门及大学堂并应特科岁举之

选^[19]。这样,对新学旧学的取舍以及围绕学堂和学会的纷争就绝不只是为蝇头小利,而是在新旧交替的潮流中抢占先机免遭淘汰或至少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斗争。因此,随着各项文化新政自上而下波及全省,发端于省城权力中心的攻击新政事件也引起广泛共鸣,发展为全省范围内的反维新运动。抽象地说,科举考试内容和程序的变革挑战了旧精英统治帝国的合法性和垄断地位,并为新精英崛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一精英轮替的必然趋势由于湖南文化新政的激烈开展被迅速落到了实处,在此情形下,处于劣势的旧精英联合起来抵制维新,引起精英集团分裂并带来大范围的社会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有一种公认的说法:湖南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旧交锋最激烈的地区,支持这一说法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发生在1898年的这场争端。对此,论者常从湖南历史文化的区域特征以至湖南人的性格等方面寻求解释,都不无真知灼见。然而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发现这个案例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它清晰地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的分裂与冲突,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文化权力结构的变迁有关联,而这一点由于科举制被废除时的波澜不惊而常被忽视。与此同时,这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一场掩盖在意识形态外衣下的对社会政治权利的激烈争夺,其结果,由省府大吏主持并得到皇帝嘉许的湖南维新运动还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便被摧毁,这也就是说,集新文化精英、开明官吏和皇帝三者的力量都无法撼动一个省的文化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这一事实有利于我们理解儒教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不同寻常的阻力!

注释:

① 相关论述见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82-16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丁平一著《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第三、四、五章,湖南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另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51-37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② 张祖同乃京官张百熙之兄,张百熙时为内阁学士,张祖同为候补郎中;黄自元曾授翰林院编修,甲午后主讲于湘水校经堂及长沙成德书院;孔宪教为分省补用道。他们都曾创办近代企业,张、黄还是时务学堂绅董。叶德辉时为在籍吏部主事。请参阅《湖南历代人名词典》编委会编《湖南历代人名词典》1993年版。

参考文献:

- [1] 罗志田. 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J]. 近代史研究, 1998, (5): 51-58.
- [2] 罗志田. 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 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J]. 历史研究, 1998, (5): 56-58.
- [3] 丁平一. 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8.
- [4] 罗志田. 权势转换: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 [5] 熊希龄. 上陈中丞书[N]. 《湘报》第112号, 1898-07-16(1).
- [6] 皮锡瑞. 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 闰三月初四日, 四月初八日)[J]. 湖南历史资料, 1959, (1): 80-122.
- [7] 皮锡瑞. 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J]. 湖南历史资料, 1959, (1): 116-158.
- [8] 梁鼎芬. 与王祭酒书[A]. 中国史学会. 戊戌变法(二)[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9] 王先谦. 岳麓书院院长王月课改革手谕[J]. 湘学报(第九册),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 [10] 许姬传. 七十年见闻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1] 徐仁铸. 与徐学使仁铸[A]. 岳麓书社. 葵园四种[C].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12] 王先谦. 与徐学使仁铸[A]. 岳麓书社. 葵园四种[C].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13]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4] 唐才常. 湘报序[N]. 湘报(第1号), 1898.3.7(1).
- [15] 皮锡瑞. 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三日, 十五日, 二十七日)[J]. 湖南历史资料, 1958, (4): 65-126.
- [16]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17]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2.
- [18] 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J]. 湘学报(第二十五册),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19] 南学会总会章程[N]. 湘报(第35号), 1898-04-11(1).

A research on the failure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1898 in Hunan province

HE Wen hui

(Hunan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evere conflict dur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1898 in Hunan Province. The reason of the conflict was the re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with the change of provincial officials and the arrival of cultural vanguards, especially the severe unbalance of cultural power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aroused by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is process, the old elite, whose interests were infringed and faced with elimination, united to attack fiercely the course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This example is usually used to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Hunan, and it is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cience as well.

Key words: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1898 Hunan Province; re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political conflict

[编辑: 颜关明]